

农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逻辑与动力机制

龚 雯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8日

摘 要

农文旅融合不仅改变乡村产业结构,也推动乡村社会关系由封闭型熟人共同体向开放型复合共同体转型。本文以曲靖市马龙区多个典型旅居村落为案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这一转型的生成机制与内在限度。研究发现,这些村落的社会关系重构并非传统社会资本的自然延续,而是外源资本、制度安排与市场需求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外嵌性社会资本”重组过程。其优势在于通过多元主体嵌入快速扩展关系网络,通过契约规则与乡土伦理嵌合重塑互惠规范,并通过制度保障生成有限普遍信任;其风险则在于新型社会资本过度附着于外部企业和市场渠道,容易导致乡村主体性不足与情感共同体弱化。本文认为,农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关键,在于推动外嵌性社会资本向内生性社会资本转化,在开放发展与社区自主、契约理性与乡土温情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关键词

农文旅融合, 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关系

The Logic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Agriculture-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Wen Gong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ly 26, 2026; accepted: August 18, 2026; published: August 28, 2026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not only transforms r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but also promotes a shift in rural social relations from closed, familiar communities to open, complex communities. Taking several typical tourist-resident villages in Malong District, Qujing City, as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internal limitation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se villages is not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 but rather a process of reconfiguring “externally embedded social capital” shaped by external capit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market demands. Its strengths lie in rapidly expanding relational networks through multi-actor embedding, reshaping norms of reciprocity by integrating contractual rules with local ethics, and generating limited universal trust through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However, risks arise when new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become overly dependent on external enterprises and market channels, potentially weakening rural agency and eroding emotional community bon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key to reconstructing rural social relations under the context of agricultural-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lies in transforming externally embedded social capital into endogenous social capital, achiev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open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autonomy, contract-based rationality, and local warmth.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Social Capital, Rural Social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前乡村现代化转型与政策驱动的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农文旅融合不仅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活乡村资源价值的重要路径，也正在改变乡村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通过对曲靖市马龙区典型农文旅融合村落的实地调研发现，许多村庄依托产业融合实现了发展形态的快速转换。闲置农房被改造，低效土地被整合用于花卉种植和乡村景观营造，村庄公共空间、服务业态与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外来旅居客、文旅企业、返乡青年和本地村民在同一村庄空间中形成高频互动[1]。值得注意的是，农文旅融合在这些村庄并不只是产业叠加和空间更新，更通过资源盘活、业态导入和主体重组，改变了村庄原有的交往边界、合作规则与信任基础。

传统乡村社会关系主要依托亲缘、地缘和熟人交往维系，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与同质性。而农文旅融合带来的外部资本、市场机制和外来群体，则不断打破原有社会边界，推动村庄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结构发生变化。曲靖市马龙区典型农文旅融合村落由此呈现出一种由封闭型熟人共同体向开放型复合共同体转型的趋势。值得追问的是，这种转型究竟是传统社会资本的自然延续，还是外部力量嵌入后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重组？其在拓展关系网络、重塑合作规范、生成制度信任的同时，又是否可能带来乡村主体性不足与情感共同体弱化等新的问题？

梳理现有研究，当前学界围绕农文旅融合的探讨多聚焦产业模式与治理机制，针对马龙区旅居村的

已有研究中,段林鑫等人从嵌入式治理视角分析了旅居产业治理结构的演变与多中心互动[2],江百舸、李凯则重点研究了当地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模式[3],相关成果普遍侧重结构与制度层面,对社会关系的微观变化关注不足。而在乡村社会关系重构领域,学者主要从动因、形态、实质三个维度展开研究:城镇化与市场化是传统乡村关系解构的主要诱因,“后乡土”时代乡村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4];从变化形态看,新媒体不断打破地缘、血缘的限制,推动乡村社交走向多元开放[5],但同时也维系了乡村公共空间[6];从本质来看,乡村正从伦理共同体转向利益共同体,市场化让传统人情逐步具备工具理性,乡村信任体系与价值观念持续转型[7]。既有研究指出,社会资本与乡村社会关系高度耦合,信任、互惠规范与合作机制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是乡村社会关系存续与演变的重要支撑,产业与市场带来的人际变动,本质也是社会资本的重塑过程[8]。社会资本理论聚焦人际联结所产生的资源与能力,经过布迪厄、科尔曼、帕特南等学者的发展已形成成熟体系,帕特南提出的社会网络、互惠规范、人际信任三大核心要素,尤为适配本研究场景[9]。在社会资本效应的识别研究中,曼斯基将社会互动效应区分为内生效应与外生效应:前者指个体的行为结果受群体中其他成员同类行为结果的影响,后者指个体的行为结果受群体成员外在特征的影响[10]。这一对互动效应的划分为理解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型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传统乡土社会的熟人网络高度同质,其信任与规范的生成主要依靠于长期重复博弈的“内生效应”;而在农文旅融合场域中,文旅企业、外来创客等异质主体的涌入,其携带的资本属性与市场规则对村民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外生效应”。更重要的是,这种外生效应在乡村治理与产业演进中并未停留在个体影响层面,而是通过空间盘活、制度重塑等方式,在结构上深深嵌入村庄本土场域之中。这就意味着,当前部分村庄社会关系的重组,已不再是传统社会网络要素的自然演化,而是外部资源、规则与网络节点结构性植入的结果,从而催生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形态“外嵌性社会资本”。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以曲靖市马龙区典型农文旅融合村落为案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农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逻辑。本文认为,农文旅融合推动这些村庄社会关系由封闭型熟人共同体向开放型复合共同体转型,但这一转型并非传统社会资本的自然延续,而是外源资本、制度安排与市场需求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外嵌性社会资本”重组过程。其积极效应在于快速扩展关系网络、重塑互惠规范并生成制度信任;其潜在风险则在于新型社会资本过度附着于外部企业和市场渠道,可能导致乡村主体性不足与情感共同体弱化。由此,本文试图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揭示农文旅融合社会效应的双重面向,并为同类乡村推动外嵌性社会资本向内生性社会资本转化提供参考。

2. 乡村社会资本的演替表征

“演替”原是生态学概念,主要用于描述生态系统在外部扰动和内部调适作用下,由既有结构向新的稳定结构逐步转换的过程[11]。本文借用这一概念,用于说明农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社会资本的阶段性重组与结构性转换。表1显示,农文旅融合前后,马龙区旅居村在人口流动、房屋利用、土地经营、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和就业结构等方面均发生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经济指标改善,也意味着社会关系载体的转换,具体表现为关系网络由封闭同质转向开放异质,互惠规范由人情主导转向“契约-人情”双轨协同,信任结构由熟人信任转向制度保障下的有限普遍信任。

(一) 关系网络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

农文旅融合前,当地村民的日常交往主要依托血缘、地缘和熟人关系展开,关系网络具有高密度、强情感、低开放的特征。这类关系网络有助于维系村庄内部互助与基本秩序,但也限制了外部信息、市场资源和发展机会的进入。农文旅融合推进后,村庄关系网络的开放性明显增强。

马龙区典型农文旅融合村落通过引入文旅企业盘活闲置资源,将各村闲置农房集中改造为旅居空间,建成运营的旅居村出租率处于较高水平;同时规模化流转低效土地用于花卉种植和乡村景观营造,使原

本以本村村民为主的生产生活空间转化为本地村民、文旅企业、返乡青年、外来创业者和旅居客共同参与的复合空间。由此，村民的交往对象不再局限于亲属邻里，而是扩展至企业经营者、游客、旅居者和外来服务主体；交往场景也不再限于农事互助和日常人情往来，而是延伸至房屋租赁、土地流转、旅游接待、花卉经营、公共活动和网络传播等市场化、公共化场域。外来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类似“结构洞”的桥接作用，将村庄内部熟人网络与外部市场网络、消费网络和信息网络连接起来。与此同时，短视频、微信等数字媒介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典型村庄的可见度，使村庄关系网络从线下在地交往扩展到线上传播和外部关注。由此，马龙区典型农文旅融合村的关系网络并非由熟人关系直接转向陌生人关系，而是在既有亲缘、地缘网络基础上叠加业缘、趣缘和市场关系，形成开放异质的复合型关系网络。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re indicators of typical residential tourism villages in Malong District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表 1. 马龙区典型旅居村农文旅融合前后核心指标对比

指标维度	融合前(约 2021 年前)	融合后(2024 年 6 月以来)
村庄人口	青壮年大量外流，老龄化严重	本土人口回流，外来群体驻留
房屋利用	大量土坯房、闲置老屋废弃	系统改造盘活，出租率高
土地利用	传统种植烤烟、玉米、水稻	规模化流转低效土地，连片种植花卉或营造景观
村集体收入	几乎为零	通过租金分成、产业分红等实现跃升(数万至近百万元不等)
村民收入	单一农业收入	租金 + 薪金 + 分红 + 经营多元收入，户均年增收 2~3 万元
就业情况	村民外出务工为主	带动就地就近就业，部分青年返乡创业
村庄面貌	空心村	转型为热门旅居目的地或特色文旅村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公开报道、实地调研及相关媒体资料。

(二) 互惠规范从人情主导转向“契约 - 人情”双轨协同

传统乡村互惠主要依托人情伦理和乡俗惯例运行，村民之间的互助、合作与纠纷调解多建立在熟人身份、长期交往和道德评价基础之上。农文旅融合推进后，这些村落的利益关系和合作关系明显复杂化，单纯依靠人情往来已难以有效协调村民、村集体与运营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为适应产业运营需要，村庄逐步将房屋租赁、劳务用工、收益分配、服务经营等事项纳入合同约定和规则安排之中，使合作关系从口头承诺和熟人默契，转向以契约、标准和程序为基础的制度化协作。

但契约规则的进入并不意味着乡土人情的消失。在实际运行中，各旅居村通过村民议事厅、村企协商会、院坝协商会等平台，为村民、村集体和运营主体提供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事务商议的渠道；村干部、地方精英和熟人关系仍在政策解释、分歧调解和合作促成中发挥润滑作用。同时，村规民约将诚信经营、文明待客、公共秩序等要求转化为村庄共同遵守的日常规范，使契约精神能够嵌入乡土社会的生活场景之中。由此，马龙区旅居村形成了“约定边界、人情促协商”的双轨互惠规范：契约规则提升合作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人情伦理降低多元主体交往中的摩擦成本，二者共同支撑农文旅融合中的持续合作。

(三) 信任体系从熟人信任转向制度化信任

农文旅融合前，这些村落的信任主要建立在血缘、地缘、面子和长期交往基础之上，村民之间因“知根知底”而形成稳定的熟人信任。这种信任能够维系村庄内部秩序，但其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本村熟人圈层，面对文旅企业、外来创业者和旅居群体等陌生主体时，难以直接提供充分的合作预期。农文旅融合推进后，村庄交往对象日益多元，传统熟人信任已不足以支撑跨主体、跨圈层的持续互动，信任体系

因而开始向制度化方向演替。

在这一过程中，马龙区各旅居村通过公共治理和服务保障机制增强了村庄运行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一方面，村级公共事务与财务的公开化机制等，使村庄事务、资金使用和集体收益处于相对透明的状态，降低了村民对产业运营和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感；另一方面，基层监督渠道等监督安排，将产业发展和村庄治理纳入日常监督之中，强化了规则执行的约束力。同时，旅居警务服务站和“1分钟响应”等数字化服务机制，为外来旅居群体提供安全保障，也增强了村民与外来主体之间的交往安全感。由此，村民与外来主体之间的信任不再完全依赖私人关系，而更多建立在公开信息、制度约束和公共服务所提供的稳定预期之上。但这些旅居村的信任体系并非由熟人信任直接转向完全意义上的普遍信任，而是形成了一种嵌套在熟人社会底色中的有限普遍信任。制度规则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预期，公共服务降低跨群体交往风险，日常互动则推动制度信任向情感信任延伸。只有当外来主体尊重乡风民俗、参与公共生活并融入村庄日常交往时，制度化信任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更具情感认同的社区信任。由此，马龙区旅居村的信任演替呈现出“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情感信任”的递进过程。

由此可见，马龙区旅居村社会资本的演替表现为网络、规范与信任的系统性调整。进一步看，这一转型并非传统社会资本的自然延续，而是在外源资本、制度安排与市场需求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重组过程。

3. 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动力机制

马龙区旅居村社会关系的重构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在资本嵌入、制度重塑与需求升级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动态过程。农文旅融合首先改变了村庄资源配置和产业组织方式，继而推动多元主体进入、合作规则调整和日常交往扩展，最终促使传统乡土社会关系向开放型复合关系结构转型。具体来看，其生成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资本嵌入推动乡村关系空间再组织

资本嵌入是马龙区旅居村社会关系重构的初始动力。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村民的生产生活和日常交往限定在相对固定的村庄空间之内，社会关系主要围绕农事互助、邻里往来和熟人互动展开。农文旅融合推进后，政府、企业、村集体和村民等多类主体共同参与村庄资源盘活，使原有封闭空间逐步转化为产业空间、消费空间和公共交往空间。

从投入结构看，各地通过政府整合涉农资金用于道路硬化、污水管网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改善了村庄基础设施条件。文旅企业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内部装修、家具置办和运营管理，推动闲置农房转化为旅居经营空间。村集体通过合作社整合闲置房屋和低效土地，参与土地流转、花卉销售和旅居产业分红。村民则通过房屋出租、土地流转、劳务参与和个体经营进入产业链条。表2表明，马龙区旅居村农文旅融合并非单一企业开发，而是政府基础设施投入、企业运营投入、村集体资源整合和村民要素参与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多元投入结构，为社会关系从熟人互助转向多主体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由此，这些村庄的资源不再只是传统农业生产资料，而转化为能够吸引外部主体、承载市场活动和组织公共交往的复合性资本。

资本嵌入的社会效应在于，它重组了村庄内部关系和外部连接方式。一方面，村民与村集体、企业、游客和旅居群体之间形成新的利益联结，日常交往不再局限于熟人互助，而是扩展到租赁、服务、经营和协作等市场化关系；另一方面，资本进入也改变了村庄空间使用方式，使公共空间、经营空间和生活空间相互叠加，为跨群体互动提供了现实场域。由此，资本嵌入不仅带来经济收益，更推动了乡村关系空间的再组织。

（二）制度重塑推动多元主体合作规则化

制度重塑是马龙区旅居村社会关系重构的秩序基础。农文旅融合引入了企业、返乡青年、外来旅居

者和服务主体，也使村庄利益关系明显复杂化。传统乡村社会中依靠人情、面子和口头承诺维系的交往规则，难以充分应对房屋租赁、土地经营、收益分配、服务管理和公共事务协商等新问题。为降低合作不确定性，调研村落逐步将多元主体互动纳入规则化、程序化和协商化轨道。

Table 2. The structure of “four-party invest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ypical residential tourism villages of Malong District

表 2. 马龙区典型旅居村“四方投入”与收益分配结构

参与主体	投入方式	投入规模(典型案例)	收益方式(目标)	收益规模
政府	涉农资金整合 (基础设施)	500 万~700 余万元	政策目标：乡村振兴示范 效应	—
村集体(合作社)	统一租赁闲置房屋、 流转土地	各村不等(如核心示范村流转 闲置房屋 70 余间、土地百余 至千余亩不等)	土地流转服务费、 房屋租金分成、 产业分红	6 万~88 万元/年
企业	内部装修、家具置办、 运营管理	400 余万元 (以核心示范村为例)	客房出租、经营场所出租	依各村运营 情况而定
村民	房屋出租、土地流转、 劳务投入	闲置房屋 + 土地 + 劳动力	房屋租金、土地租金、务 工工资、个体经营	户均年增收 2.4 万 ~3 万元不等

数据来源：地方政府公开报道、实地调研及相关媒体资料。

具体而言，村庄通过标准化房屋租赁合同、收益分配规则、劳务薪酬安排和服务经营规范，明确村民、村集体与运营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边界。通过村民议事厅、村企协商会和院坝协商会等平台，建立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事务商议机制；通过村规民约，将诚信经营、文明待客、公共秩序等要求转化为村庄日常规范。制度安排的进入，使村庄合作关系从熟人默契和非正式协调，转向契约规则与协商程序支撑下的稳定合作。

但制度重塑并不是对乡土关系的完全替代。在实际运行中，村干部、村庄内部的意见领袖和熟人网络仍在政策解释、矛盾调解和合作促成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马龙区旅居村社会关系的规则化并非单纯市场契约化，而是制度规则与乡土伦理相互嵌合的过程。契约提供边界，协商提供程序，人情提供润滑，三者共同构成多元主体合作的秩序基础。

(三) 需求升级推动乡村共同体关系再生产

需求升级是马龙区旅居村社会关系重构的内生动力。农文旅融合改变了村民原有的收入结构和生活预期，村民不再单纯依靠传统农业收入，而是通过租金、工资、分红、经营收益等多元渠道参与村庄发展。收入来源的变化推动村民从被动适应产业导入，逐步转向主动参与资源整合、服务供给和公共事务协商。

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经济收入提高，更表现为村民社会需求的扩展。对本地村民而言，农文旅融合带来了就业、经营、培训和外部资源连接机会，唤醒了其参与社区治理和产业发展的诉求，部分村庄精英和积极分子开始尝试从传统生产者转向服务参与者、空间经营者和社区共建者。对返乡青年而言，村庄转型提供了创业和价值实现空间，使其成为连接本土社会与外部市场的重要中介。对旅居群体而言，乡村不只是消费场所，也逐渐成为生活体验、社交互动和情感归属的空间。不同主体需求的叠加，推动村庄从单一生产共同体转向生活、消费、治理和情感交往相互交织的复合共同体。

由此，马龙区旅居村社会关系重构并非简单由外部资本推动，而是在村民需求变化和主体参与意识提升中获得持续动力。资本嵌入提供了关系重组的资源条件，制度重塑提供了多元合作的秩序框架，需

求升级为村庄社会关系从外部导入走向内部再生产提供了潜在动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农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生成机制。

4. 隐忧与反思：社会资本演替的脆弱性

虽然马龙区旅居村取得了经济与治理双重成效，但依托外源资本塑造的新型社会关系体系，在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

乡村社会关系对市场化社会资本具备高度敏感性，过度依赖外源资本易引发“乡土主体性悬浮”风险。马龙区旅居村全新的关系网络、互惠规范与信任格局，均依托农文旅资本注入与市场化运营形成，社会资本的存续状态直接决定社会关系的稳定态势。村庄采用“企业运营、村民参与”模式，外部文旅企业掌握营销、定价与文化阐释等核心权限，是市场化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普通村民多以房屋出租、零散务工参与产业发展，仅承担空间出租者与基础服务角色，在产业发展与村庄治理中话语权不足、实质参与有限。由于村庄尚未培育成熟的村民自治组织与内生社会资本，一旦外部资本收缩或企业运营退出，现有依托外源资本形成的多元交往网络与市场化互惠关系将难以维系，社会关系重构进程可能停滞甚至倒退，使得乡土发展主体性弱化，社会关系转型沦为资本逻辑的附庸。

同时，新型社会资本的结构性短板，使其重塑社会关系的过程存在内在脆弱性，容易诱发“情感隔离”与“村落异化”问题。农文旅融合催生的契约型、工具型社会资本，以利益互惠与制度规则为核心，虽有效重塑了制度化互惠关系、提升协作效率，但不断挤压传统情感型社会资本的生存空间，导致乡土人情互助伦理持续消解。当前原住民与外来旅居客、创业群体的联结多依托商业服务与市场交易等浅层场景，缺乏基于乡土认同、人情互动的深度情感纽带。市场化社会资本主导下的浅层交往，易形成“空间同场而心理区隔”的结构，阻碍新老村民的深度融合，造成社群归属感割裂。这种重理性、轻温情的资本重构方式，虽推动社会关系现代化转型，却弱化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如何在社会资本迭代中平衡市场理性与乡土人文温度，是农文旅融合驱动乡村社会转型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课题。

5. 结论与启示

曲靖市马龙区典型农文旅融合村落的实践表明，乡村社会关系重构并不是传统社会资本的简单消亡，而是关系网络、互惠规范与信任结构的系统性演替。从理论层面看，田野经验揭示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内生积累的社会资本生成方式。农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增量并不完全来自村庄内部长期互动，而是源于外部企业、外来创业者等异质主体的嵌入。由此形成的“外嵌性社会资本”，虽能在较短时间内扩展关系网络、生成制度化信任，但其网络资源和运营能力高度附着于外部主体，表现出较强的工具理性特征与内在脆弱性。

面对“外嵌性社会资本”可能导致的乡村主体性悬浮与情感隔离风险，同类乡村在推进农文旅融合时，必须跨越单纯的资源导入阶段，致力于构建从“外嵌”向“内生”转化的动力机制。“向内生转化”绝非退回传统的封闭熟人网络，而是将外部导入的契约精神、市场资源与跨界网络真正“内化”为乡村自主的集体行动能力。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条路径实现外部资本的在地化与契约关系的社区化：第一，在经济利益层面，推行“产权纽带”与“交叉持股”，实现从租赁关系向利益共同体的转化。第二，在能力建设层面，实施“在地化人才赋能”，实现从劳务输出向社区能力内化的转化。第三，在社会交往层面，开展“空间共享”与“社区营造”，实现从契约信任向情感认同的升华。唯有在开放与自主、理性与温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农文旅融合背景下的乡村社会关系重构才能真正走向可持续的社区振兴。

参考文献

- [1] 云南曲靖：“空心村”蝶变旅居村[EB/OL]. 2024-04-15.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1115/3b36f2c9d221408988e8f22512df25e1/c.html>, 2026-04-05.

- [2] 段林鑫, 李娅, 申燕. 组织嵌入视角下旅居产业推动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基于云南省土瓜冲村的案例研究[J]. 现代农业研究, 2025, 31(11): 25-29.
- [3] 江百舸, 李凯. 乡村旅居目的地利益联结机制研究——以曲靖市马龙区土瓜冲村为例[J]. 红河学院学报, 2025, 23(6): 128-133.
- [4] 郭长伟, 王跃. 破土与重建: “后乡土”时代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研究[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2(3): 131-135.
- [5] 张丽娜. 微信影响下土家族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基于对青冈林湾“红白喜事”现象的田野调查[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6] 冯广圣, 王灿. 消解与重构: 新媒体与乡村人际关系的再造——基于豫东南 C 村的田野考察[J]. 新闻知识, 2021(10): 59-64.
- [7] 李文祥, 王俊雅. 共同体关系的消解与重塑: 村落社会的变迁机制研究[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5(1): 147-156.
- [8] 牛喜霞.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2.
- [9] 张文宏.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3(4): 23-35.
- [10] Manski, C.F. (1993) Identification of Endogenous Social Effects: The Reflection Proble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 531-542. <https://doi.org/10.2307/2298123>
- [11] Clements, F.E. (1916) Plant Succession;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Vegetati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https://doi.org/10.5962/bhl.title.56234>